

# 水与火的洗礼

——张宣强《美女晒羞》的文化解读

雷升录

(安康师范专科学校 中文系, 陕西 安康 725000)

**摘要:** 自然的山水孕育着自然的文化。植根于自然的文化无处不浸透着人类原生态的生存意指——食与色。高古苍茫的巴山、秀丽艳冶的汉水孕育出的就是这样的文化。张宣强的《美女晒羞》既展现着这一古朴、苍凉、率真、粗放的文化画卷, 同时, 他也尽其所能地解读这一图符语码中所潜匿的生存本真。

**关键词:** 美女晒羞; 自然; 文化; 语码; 解读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024X (2004) 06 - 0036 - 05

## The Baptise of Water and Fire

LEI Shenglu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kang Teachers' College, Ankang725000, Shaanxi, China)

**Abstract:** different mountains and water nurtures unusual culture. The culture that originated from the nature gives birth to the very remote civilization—the hunger of food and love. The magnificent and primitive Mountain BA and the charming Han River has foster a writer who has recreated the picture again with true and honest writing in his novel the Nude Woman.

**Key words:** the Nude Woman; nature; culture; decoding

对于行将步入知天命之年方完成他的长篇处女作《美女晒羞》的张宣强来说, 寻求安生立命之根, 便是赢得生命的充盈与丰沛的第一要务了。张宣强并非职业作家, 他现实的谋生运作和他作为文化人的身份是不相隶属的, 因而, 他的文本中绝少职业作家的秀作, 他只是要通过小说这一文本形式为自己的文化人身份也为自己作为人的存在予以本体性的规约, 这一规约, 不是基于自我的主观好恶, 抑或是所谓高扬主体的理性抉择, 而是植根于拥有甚至彻底占有了自我的生存文化。《美女晒羞》正是既通过自我浸淫于其中让自我意识自然绽露, 又通过外在自我以独特视角对这里的习俗风情予以窥视来展示自我生存于其中、并规约了自我本性的生存地域文化。

特定的地域孕育着特定形态的文化。川陕鄂渝交界的大巴山区, 是群山的世界, 山连着山, 山叠着山, 连同山间的小溪、河流一并构成了这里亘古绵延的地域世界, 在这一世界中, 一切都是自然的。美女晒羞就是这毫不遮掩的大自然, 同时也是这一境遇中的自然积淀的人文文化, 它质朴、轻灵、温馨、大方、率真、粗旷、坦达、疏朗, 绝不同于那典雅凝重的周鲁文化, 面对自然羞羞答答, 尤其是把被先圣视为人之大欲的色——这一人类千百万年绵延不绝的生存自然半遮半露地隐含在一个文绉绉的“孝”行中。

自然的形式, 生存的现实, 孕育了文化的自然性, 《美女晒羞》的故事, 展示的就是这一生存的自然, 也是这一自然的文化。

整个文本的叙事在山连着山的地域世界展开。它以“我”与黄百合的情爱故事为主线, 以大毛子对我的开蒙及他的性爱与婚姻故事为叙事契机, 以宋大可的民歌咏唱和生死观为基调, 以古老油坊的榨油过程为基本隐喻, 以周德山的故事和黄百合的创业为不同时代的表征, 最终以与黄百合为相互表

收稿日期: 2004 - 09 - 10

基金项目: 安康师范专科学校专项科研项目 (2003AZXZ004)。

作者简介: 雷升录 (1962 - ), 男, 陕西合阳人, 安康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

里的山水自然文化母体为归依，描述了这一生存境遇中众多男女演绎的世俗风情，在这一风情的描绘中，作者着力要呈现的是这一风情中浸透着的古朴淳郁的自然文化，也正是这一文化构成了生存于这一特定地域中的芸芸众生的自我本质。

人的本质是自然文化的展开。“我”作为下乡体验的作家，作家身份实际上只是“我”逃离闹市浮华、寻觅自我本真、意欲再归故里重温那渐渐淡却的追忆而假借的冠冕堂皇的措辞。“我”回故乡的真实意图是拖着心力焦瘁的躯体解读美女晒羞那样的自然，重温与这美女晒羞同一的既是情人、又似母亲、更是自然的百合的眷恋柔情，并期冀在这解读与重温中寻觅出那为世俗的卑陋尘封已久的自我。对“我”来说，只有百合——这有待于“我”完全展开的书卷，才能解除闹市纷杂给我带来的疲惫，“我”才能破译出为商品社会日渐货币化了的自我本性，为我的生存获得真切的实在性，也只有黄百合这里，“我”才能重新激活那日渐枯萎的生命之根并唤醒早已沉入迷醉状态的创造活力。

回归故乡借住黄百合家，直指矢的，撕脱了世俗文化强加于“我”的伪饰，道出了回归的真实意图。“四十七八岁”似乎既指向自我身心力有不逮的疲惫又包裹着伦理道德义务的伪饰，这一疲惫与伪饰为妻子很通达的“四十如虎”的玩话所确证。在为金钱迷失了自我的闹市中，“我”深深感到的是雄性的疲软，因而那与勃起同步而行的创造力也就行将枯竭，于是踏入故乡，“我”首先追寻的便是首次勃起的生命历程。

在自然孕育的这一方土文化中，男性的开蒙与独立、伟岸与创造，永远是与雄性的勃起同步的。

“我”的开蒙是在自然中进行的，幼童时面对的是被名为“美女晒羞”的那座山，学童时是通过大毛子对那山形的诠释，于懵懵瞳瞳中粗识了生命的隐秘，少年时模仿父亲，立一块条石在石缝间，同时还有与那座山同构的黄百合的嬉戏，于是15岁时，生命的自然呈现出了它的神奇性，生命的奇迹让“我”读懂了美女晒羞中蕴涵的生命隐秘，黄百合让我在狄奥尼索斯式的颠醉狂欢中领略了雄性生命的伟岸和雄性勃起的自豪。

自然是神奇的，而人类文化更神奇。在自然造化的人类所有器官中，唯一被文化了的就是生命之根，同时在人类文化的所有形态中，也没有哪一种文化比这一基源于自然人性的文化更加困绕人类的理性精神。他时而是生命的活水，快乐的源泉，神奇的创造力，时而又是恶魔之棒，罪恶的渊藪，邪恶的祸根，这正如集创造与毁灭于一体的印度大神——湿婆一样，它是美是爱，爱神、美神皆由它而生，它又是丑是恶，宇宙的一切毁灭能量都溯源于它。连三博士朝拜婴儿的耶稣时都以钦敬的目光注视着这一焦点，人类始祖亚当犯禁之后，体形的首要变化便是既为他也为他的后裔们生出了这一祸根，于是亚当及其后裔们不得不拖着这沉重的时时将主体弃置于煎熬与罪恶深渊的累赘走向尘世生活。

性器官这一特定的自然文化，它既是我们各类文化的母体，也是人类文化的最高表述形式，然而奇怪的是，这一最为古老的文化，对于富有卓越智慧的既能踏入月球、也能步入太空的人类来说，直至今日，我们都却很难看到历史的渐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难确切地界定究竟是人类理性在控制着这一独特的人体器官，还是这一器官在控制着我们的理性。难怪六十年代初当记者们质问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美国为什么还要进行越战时，无奈之际林登解开裤子，朝自己的裆部指了指“就为这个”。

大毛子就为这一器官所控制，结果要么是通过意淫来渲泻、释放这一自然的能量，要么是通过鞭打公羊所唤起的快慰来舒解那扭曲了的本性，最终他在嫂子这儿以自然的原始的粗野方式既释放了郁积多年的能量，也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然而为这一宣泄——这一撒播生命之种的行为他却不得不付出毁灭性的沉重代价，他败坏了人伦，破坏了军婚，且在为嫂子捏破了卵子被彻底断却了生命之根的绝望中疯癫死去。荀子三用自己的这一器官操纵着金钱和权力的使用，将年迈疲软缺乏活力的生命种子撒播在金寡妇和她的二儿媳江秀珍的肥田沃土上，结果导致父子失和、声名狼藉。唐秀儿似乎以理性控制着自己的这一器官，抗拒着这一器官的自然绽露，使之面对自由社会的金钱开放，将之商品化为男人们快乐的源泉，最终踏上了不归路。在这里出问题的不是自然的性，而是对自然性的背离，把自然性的偶而释放强行纳入伦理性婚姻的规约，或是越界，将性的自然和谐置放于不和谐的基础

上，或是出轨，将自然的器官，纳入社会的商品流通，且对之货币化。对于荀子三和唐秀儿来说其对自然性的背离是金钱控制了器官，或是器官操纵了理性，于是自然状态中性应具有的温情要义消匿了，性成为工业社会专供流通的商品，大毛子的性冲动虽具有彻底的自然性，然十足的自然就不再是自然了，而是原始的粗野、直裸与蒙昧，对于社会人来说，所谓自然只是意指文化或人的行为的率真与质朴，社会的、文化的蕴涵一旦缺失，它所具有的只是野性的赤裸裸，因而女人这把能奏出和谐乐章的多弦琴，大毛子奏不响，他不懂自然本身就是文化，他最多只能是在旋律节奏的间隙中，为着提示偶尔敲一声梆子。

性在这里只有在“我”和黄百合、胡红之间它才既展现为自然的，又呈现为文化的，这里没有大毛子面对美女晒羞的无限遐想，也不会如他那样二十六七岁尚未阅读人生最玄妙的文本而对公羊的性行为产生难奈的嫉妒，狠心地要骗掉它，这里更没有荀子三和唐秀儿对人性的偏离——一手捂着羞，一手拿着钞票。在这里没有变形，没有扭曲，一切都是自然的，这一自然性既是男女两性自然感官的愉悦，也是男女双方各自寻回了自己匮乏的另一半而激起的无限欣喜，它契合着文化为人类这一器官的运作规则提供的非道德的价值指向。虽然在意识深处“我”时时关注着我的性器官，这是生成“我”的这一文化赋予“我”的自我本性，但“我”的文化人角色和四十六七岁的年纪，却使“我”拥有更文化了的理性，“我”总是用理性规约着这一器官的使用，即使它是非道德的，可它是文化的、自然的。虽然初尝禁果时，更多的是情欲，但也绝不是如同大毛子和曹桂芝那样，基于原始粗野、未加修琢的物质本性，而象饥饿时对食物的贪婪一样。“我”与黄百合的初次交合，就如同中学生阅读老师布置的既有趣味又是任务的课外书那样，不过这一行为在人生中不是课外，而是人生业内的必修文本。我们走进美女晒羞的羞处，“我”真正读懂的是这一羞正是美女之美，是人生的玄妙，这是男人创造力的第一次尝试，也是人生中一堂既严肃又充满欢愉的启蒙课，通过这一课我读懂了美女晒羞，也正是通过男人的创造力，黄百合神采奕奕了。这一次的探险既使我具有了男子汉的自信，也使黄百合具了女性的风韵，这是根的创造，是生命的重造，即使他们二人后来反复阅读人生这一章节，但它永远不是饥饿时面对食物的贪婪，它始终如同幼童在温习功课一样，因为“我”与黄百合的中学文化程度奠定了这一阅读与温习的基础。理性对生理器官的规约使“我”抵制了自然的诱惑，胡萍萍的，汪秀珍的，甚至还有未呈现于当下意识的胡姗姗及唐秀儿的，因之他的器官拒绝为自然文化之外的任何意图服役。“我”的文化人身份保证了“我”的这一行为的文化指向，显然“我”无论是在与黄百合，还是在与具高中文化的胡红的性交往中，“我”的器官始终是沿着文化赋予这一器官的正当运作途径而运作的，虽然它是非伦理的，但它是人性的、自然的、文化的。

性在文化中无论被赋予了什么样的道德指向，但对生存于这片山连着山的地域中，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然生活的男男女女们来说，它最基本的首先是植根于自然本性这一基体上。男女两性未加雕琢的自然本性，在美女晒羞的羞处和距它不远的石王爷的石柱上充分地展现了出来，这是原始的自然崇拜，是这片山民所敬畏的至高的神明，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宗教，羞处所孕育的是神秘的延续生命与毁灭生命的生死能量。从这里走向生的是胡红，踏入地狱之门的是贺东平、彭仁厚。石王爷是与美女晒羞相对抗的再生力量，他是这里顶天的立柱，是与这山同一了的男性的勃起，它赋予这山以灵魂、以创造性的蕴力，当然首先是生命的创造。在这一特定的地域中，性对具有创造力的男性来说，无论怎样夸大它对人生的意义，都不过分。自然生命的创造是需要力的运作，这力的运作，是这些山之精灵的创造力的具像形式，因而它被山民们具像化为油坊中榨油过程的挤压。

挤压不仅是生命的创造过程，而且是生存于这片土地上的芸芸众生们自从厌倦了孩童们斗蛐蛐、过家家的游戏之后，必而且渴望介入的新的成人们的游戏，在这一游戏中，人们渴求的不只是个己生命的延续，或铸造山魂，而且是要通过这一形式确认自我生存的本体性意义。对于生存于斯的精灵们来说，终日的汗流浹背，甚至泪流满面，在饥馑与困顿的煎熬中，勉强度日，他们唯有的人生快慰，便是这一既不需要物资耗费且又具高度人性化、自然化的生命存在形态，且只有这一形式才使灰浊的生命超越了纯粹的物质存在，它是大自然赋予人——这一生物存在最高级形态以人的角色认同和生命自觉的最高级游戏形式，它是这片山民唯一的、也是最高最直接的提升生命境界的基本途径，因

而这里的山水、劳作，一切行为及口语、俚语、民间小调无不充盈着这一欢乐化和节仪式的色情隐喻，这正如同关中大汉的高吼一声秦腔以炫示着勃起的亢奋与伟力所具有的那十分的自信和自豪一样。

榨油坊的运作正是石王爷和美女晒羞的合一，也是这一山水文化的隐喻形式。那一个精赤赤的山灵，在这里绽露出他们的粗野、直接、感性化的自然本真，他们在污浊的气息中，欢跃地从事着这一古老的劳作，这是神秘快乐的生命之舞，恰好这一劳作的场景正是展现于美女晒羞的羞处，它更易唤起这些雄性生命力的高亢，于是当挤压的木杵冲向石墩上的物质，它所唤起的恰似性行为中的冲刺所具的快感，当汁液被榨出汨汨而流时，人们从此获得的是一种释放了的快慰。油坊的被烧和石王爷的毁塌似乎使这里失却了雄性勃起的伟力，因而宋大可临终坚持要整修石王爷祠，似乎他竭力想通过这一更修以唤起那雄性伟大所孕涵的创造。可石王爷祠终是修不起来了，正如晚明之际的国势不振，我们便派出一位缺乏阳具的郑和，带着道士，展开阴阳图，远走他乡，以寻回那失却了的宝物那样的徒劳无益一样，这一倒塌，是因为它失却了赖以挺立的元气，正如男根的坚挺是充血的结果，这一血在当代只意味着时代更迭赋予这山以魂灵的现代创造力，而这里男人的因循，锢闭，使它再也无法挺立，于是朱大元、朱二元在胡红面前，再也无力勃起了，黄百合孤寡了，荀子三只有借助着儿子的金钱这济如伟哥般的春药方能勉强勃起。唐秀儿无奈之际，只有出外去寻觅。因而宋大可给自己骨灰盒上的天地人三合一图示，意欲要重新建构起的正是在他看来这里失调了的阴阳平衡。于是那骨灰盒上的图符分别指向的是无私的母亲大地（女性裸体）和自然的天（太阳），更重要的是沟通这天与地的人（石笋），沟通的途径便是那作为雨的前奏的云，这是一种自然的纯真，在这一纯真中孕育创造的正是运动的热力——火，因而宋大可认定自己是在火中生，且执意要在火中死，这一祈求正如涅槃中的凤凰一样，他想通过火的沐浴走向更生。这一火——生命之源的产生，正是石王爷柱与美女晒羞摩擦冲撞的结果，这是古老的山间信仰，但它是过去的山魂，宋大可生活于这过去的山间，他不明白依靠着这一自然的和合再也无力使这山重新勃起。“我”的勃起正是基于这纯真的自然，且又于这自然的真纯之中，注入了与时俱进的文化，也正是这一文化的纯真自然，才使“我”在与黄百合，胡红的关系中，重浴了火的洗礼，走向了新生，也正是它，重新激活了黄百合，也给胡红留下了永久的生存渴望。这一新的血液的注入，就是现代这山间所匮乏的能赋予这山以魂灵的创造力。在他离开这里的前两天，他与黄百合交欢的猛烈冲刺，既是力的创造，也是他沐浴后重生的标识，同时也是在这一力的重新唤起中，黄百合更生了。宋大可作为过去的山魂他不明白，是文化才重新唤起了这山的活气，赋予这山以新的灵魂，因而给这山带来活力的不仅是自然的纯真，更是超越了这一自然的文化——现代创造力，黄百合、胡红、胡姗姗作为这一新的文化的表征，她们的创造正是因缘于这一文化。

对于生存于这一方域的众生来说，原生的自然造就了他们的物质，走向幸福摆脱饥谨成为他们生命的基本欲求，然而走向幸福摆脱饥谨过程与文化的重合性质使这群男女处于迷惑状态。大毛子本着纯粹的自然无法将这一自然的本性融入时代性的文化，因而总是在自己的本能行为中寻找与那山的形态及山羊行为的同构性，于是意欲带着这自然的纯粹踏入现代社会的婚姻，这就注定了他的悲剧性，彭仁寿以自然的粗野蒙昧欲求步入社会文化所认可的幸福，也只能是失败的，对周萍萍、周德山而言，一方面是纯粹的野性化的自然，另一方面是为时代所极端化了的他们永远无法理解的超我文化，因而他们的行为就如同这片山水所赋予他们的已经迷失了的本性，也终究是迷失的，甚至对传说中的贺白虎也同样，对荀子三的两个儿子及唐秀儿而言，这一本性的迷失，使他们不得不承担起犯罪、堕落甚至毁灭的重负，而在这一自然欲求和文化的重合关系中始终不会迷失的就只有黄百合了。

黄百合是作者倾力塑造的一个完满化的人物。她性格的基本内涵是自持而充实。充实是自然赋予她的本性，自然是文化塑造的她的性格。黄百合与“我”的第一次性行为，既不是自然的发泄，也不是性器官迫使他种目的不得不作出的屈从，更不是为着固偶的一种手段，它既是自然的绽露，也是自然文化的渴慕及人生的实践，更是对人生某一章节的初次阅读，就如中学生预习功课。因而它不指涉婚姻，也不指向世俗的交易，而是于这行为中，提升着人生的境界，这是少女首次向世界、向自然、向文化敞开了她作为女人的自然纯真，正是这一纯真，这早年的初恋记忆就被她无庸讳言地带入

了她与贺东平的婚姻中，因为这纯真不是对初恋情人的，而是对自我的，这是她自持本性赖以建立的基础，因着这一基础即便后来忍受了多年寡妇生活任妇联主任的时候，她也不会背弃这一自然纯真的本质，而将性作为自己职务升迁的砝码，因而宁可辞职，也不丢弃自己的自持品格，即便他归乡后，他们重温旧梦，她也同样没有迷失这一自我纯真的本性，这一重温，既不指向婚姻，也不指向生死相依，而只是指向人世间的某种神秘情愫，这一情愫正是人类生存的希冀。在那动乱的年代她没有迷失这一自我本性，始终是自我的，虽然这一历史的谬误，对她而言是不可理解的，但她本着人性的纯真和自持的品格，没有将自我迷失在这一时代文化中，而让时代文化吞噬了自我。

自持使她具有了不靠天，不靠地，不靠他人，只有靠自己的自立意识，于是她带领众乡邻开始了走出贫困的创业，兴复榨油厂、创办石材加工厂，日渐使山间有了活气，同时自然赋予她的纯真，使她回报着这片养育她的土地，于是捐款修路，投资兴校，这使她成为这片大地的化身母亲，因而赢得了母亲般的膜拜。正是这如大地母亲的宽阔无私和纯真，才使她拥有了大地母亲般的胸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容即充实。她没有丈夫，没有儿女、兄弟姐妹，于是充实于她心灵世界的自然是她的亲情，这一亲情，既是关于众乡邻的，也是关于这方水土的，甚至是私家仇敌，因而处于她周围和她形成准亲情关系的便是那自然的及无人领养的生灵，她接济了丈夫的前妻及其与小叔子的儿子，收养了土匪贺白虎的儿子，娶了杀自己丈夫的仇人的女儿作儿媳，甚至救助了给她制造了永久伤害，并始终咒骂她且最终放火烧了她油坊的周德山。她生命的充实就源于这一对故乡母亲的回报和大自然广纳万物的无私胸襟，甚至对她的情人也无私地分与胡红共享。

就是在这代表大自然的纯真和伟大的母亲般的胸襟里，作为文化人的“我”才得以复活，“我”一踏入她家，她呈现在“我”面前时就既是情人，又是漂泊在外的游子的母亲，同时也是航行于茫茫大海中的水手们渴望憩息于其中的灯塔下的港湾。“我”的生命力正是在这母亲的怀抱中被激活，也只是在这怀抱里，“我”才重新唤起了男性生命的伟岸。

黄百合是自然纯真的化身，是大地母亲的象征，是男性生命力勃起的源泉。

文章最末的两封信是唐秀儿和胡红的，它分别指向了基源于自然本性上的性行为的两种不同文化取向。走向纯真的自然便是再生，走向对本性的扭曲或迷失的将是毁灭。

“我”在这里，在水与火的洗礼中，寻找到了安生立命之根——自然纯真。一切文化的终极价值指归，都应是基于这一自然纯真的基体上的对生命意志和创造活力的首肯，生存于喧闹都市中的人的沮丧就是基源于一切交易化将人的自然本真湮没在金钱的尘埃中。

张宣强先生通过对山乡风俗及社会生活的描绘，让主人公沉浸于其中自我呈现又由主人公窥视，透射出这一特定地域的文化内涵。文本故事丰富，情节多样，文化蕴涵丰富，充分展示了一位地域性作家丰厚的文化涵养。这是我市第一部展现地域风俗文化的力作，也是本区作家创作具有地域特色作品的一次较成功的尝试。

当然文本尚有明显的不足，一是视域狭隘了点。地域文化蕴涵的发掘是需要具有超乎生存地域的文化视野的。但唐秀儿和荀子三两个儿子的作为明显的是作者突出了这一地域文化的优越性，似乎只是在这里才有根，于是黄百合在这里走向了成功，但唐秀儿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却意味着死亡，苟家兄弟则是投机倒把。历史规约了西部人的生存方式，对于西部内陆山区人们来说，只有走出，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才能生存，这是时代的，也是历史的警示；二是过分渲染了自然化。人类文明是在与自然对抗的基础上产生的，只有对抗才产生文明，自然化的是理想的，但它无法步入文明，我们也永远不会再步入原始的自然，任何没有文明化的自然都只能是赤裸裸的粗野，正如我们绝不能为着纯真而脱光衣服行走于街上；三是叙事方式和语言及文本结构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我们期待张宣强先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早日写出更具文化蕴涵、更成熟、更能充分体现本区创作独特风貌的佳作。